

■ 王 颀/著



Catfish Effect

一条鲇鱼

社会发展理论
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

*The Spread and
Practices of the Theory
in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王 颀 / 著

Catfish Effect

*The Spread and Practices of the Theory
in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一条鲇鱼

社会发展理论
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条鲇鱼: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王颀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9
ISBN 978-7-80230-895-4

I. 一… II. 王… III. 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国
IV.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442 号

一条鲇鱼

——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

著 者 / 王 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59367077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010)59367127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经理 / 丁 凡

责任编辑 / 丁 凡 李天明

责任校对 / 王国毅

责任印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010)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6.5

字 数 / 290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230-895-4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导言	1
----------	---

第一部分 融合与碰撞 社会发展理论的再度输入	7
------------------------------	---

第一章 社会发展理论再度输入的历史背景	11
---------------------------	----

一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社会	12
--------------------------	----

二 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开放	20
---------------------	----

第二章 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构成及其 对中国的影响	28
---	----

一 社会发展理论的传统	30
-------------------	----

二 现代化理论的开创	43
------------------	----

三 社会发展理论的多元化	49
--------------------	----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争论与评价	64
---------------------------	----

第三章 西方文化热与中西方文化的交汇	72
--------------------------	----

一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谨慎反思	73
----------------------	----

二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初探	79
-------------------------	----

第二部分 探索与实践 曲折的中国现代化道路	87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化的启蒙运动	93
----------------------	----

一 “坚船利炮”下的“师夷之长技”	93
-------------------------	----

二	戊戌变法与现代化的启蒙	97
三	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106
第五章	两条性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115
一	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化道路和孙中山的 治国方略	117
二	值得记取的一段改良主义历史	126

第三部分 突破与发展 农村的改革实践及其 对现代化理论的贡献

143

第六章	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	151
一	改革前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	152
二	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	161
三	两个全新的社会阶层	171
四	关于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几点思考	183
第七章	市场化背景下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的关系	200
一	公权外延的非理性扩张	201
二	克服公权外延的非理性扩张	208
三	农民群体的觉醒及其弱势化趋势	217
四	构建和谐의 干群关系	227
第八章	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多种选择	233
一	由河北省 H 县 C 村集体企业的兴衰说开去	234
二	家族与家堂的功能互补及其对极端集体主义的 制约	278
三	一个“没有村界”的村庄	299
参考文献		319
后 记		324

鲑鱼效应说的是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激活内部的活力，借助外力达到发展自我的目的。据说，沙丁鱼属集群性洄游鱼类，由于生性懒惰，所以被捕捞之后常因密集缺氧而窒息死亡。挪威的渔民为了提高沙丁鱼的成活率以便卖得好价钱，就在装载沙丁鱼的容器里适当地放进一些鲑鱼。鲑鱼是沙丁鱼的天敌，沙丁鱼只要一见到鲑鱼便会惊恐万状，不停游动。于是，“鲑沙同器”使生性懒惰的沙丁鱼生命力大为增强，成活率亦由此大幅度提高。

引进鲑鱼的目的是为了激活沙丁鱼，使沙丁鱼保持鲜活。但是引进鲑鱼要有个恰当的“度”，少了起不到作用，鲑鱼反而可能受欺负，多了又可能造成沙丁鱼疲劳过度，甚至大批死亡。此外，引进的鲑鱼还不能有疾患，免得传染给沙丁鱼或是给水造成污染。总之，引进鲑鱼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1979年3~5月中国连续发生了两件值得关注的事件：一是，3月中旬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为中断了27年的所谓“资产阶级伪科学”的社会学平反。^①3月底邓小平又在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②二是，4月16日~5月16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行10人的学术代表团，应

① 方明、王颀：《回顾与展望：开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1期。

②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日报社，1983。

美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正式访问了美国。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向全世界敞开大门的开始。对美国的这次访问，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和震动远远超过了访问本身。这两件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直接相关的大事都发生在 1979 年是发人深省的。

1979 年的中国正处于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历史拐点上。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毁灭性破坏，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清除和恢复的。第一，“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十年里中国损失高达 5000 亿元，相当于从 1949 年至 1977 年基本建设总投资的 80%，也超过了同一时期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①从 1978 年，至 1979 年春，安徽、四川、贵州、广东、河南等地的一些农村生产队的农民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的进一步兴起，引发了农村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变动。但是，此时城市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却举步维艰，进展缓慢。第二，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缺乏完备的理论支持。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所谓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第三，历次政治运动及“文化大革命”遗留下的大量问题引发的后遗症，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动荡与间歇性的无序状态。1949~1979 年的 30 年间造成的 440 多万所谓“地富反坏”四类分子、54 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数百万“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各种迫害的干部群众，都要求“落实政策”；再加上 2000 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求返城，已经返城的又要求立即就业；如果再加上各种实际问题所牵涉的家庭成员，与这种种问题相关的人数就会多达几亿。一时间各地的大、中、小城市都发生了上访、告状、扒火车、拦汽车、冲击政府及相关部门、围攻各级领导干部等现象。第四，社会治安问题严重，犯罪率逐年上升。1949~1978 年中国的刑事犯罪出现过两次高峰，第一次发生

^① 见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 1977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于1950年，全年共发案51万件；第二次发生于1961年，全年共发案42万件。1979年中国的刑事犯罪出现了第三次高峰，全年共发案63.6万件，发案率为6.56（发案率指每万人中刑事犯罪人员之数量）。此后连续三年刑事犯罪发案总数及发案率居高不下，1980年全年共发案75万件，发案率为7.7；1981年全年共发案89万件，发案率为8.9；1982年全年共发案74万件，发案率为7.4。这一阶段青少年犯罪案件在整个刑事案件中的比率高达70%~80%。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不断发生，各种反社会行为向社会稳定提出了挑战。^①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大多数国家是不会冒着风险继续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而是要强化社会管理尤其是要加强强制性社会控制，以便解决国家的内部问题。因为保持社会的稳定，维护必须的社会秩序，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最重要的。但是，中国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更加主动地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范围，在推进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对外开放力度。这或许是一步“险招”，没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的领导者很难下得了这样的决心，更走不出这样的“险棋”来。

面对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现实，改革从农村起步，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农民开始“包产到户”；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出现“人民公社”摘牌，更名为“乡政府”；至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开，在短短几年内就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国长达30余年的粮食问题。接着又彻底砍掉“统购统销”的尾巴，放开市场，搞活农村经济。与此同时，采取多种方式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花大气力查处“冤假错案”，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不公正待遇及受到各种迫害的干部群众及时平反昭雪，从而为推进城市及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

① 康树华：《两种经济体制下中国犯罪状况与治理》，《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

引进一条“鲇鱼”，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向世界全面开放。在经济改革取得初步成效，股份制、私有制经济、市场经济等初步站住脚，单一的计划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发生动摇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将中外文化器物层的交流引向内核文化的交流。高层次的专家学者和改革开放的设计领导者大量出国访问及一大批国外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使中国人开始了解世界，开始理解中国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从而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导引“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思想理论的生成与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开放，使以往难以解决的一些社会问题出人意料地迅速得到了解决，而且是在操作层面上解决了单纯依靠强制性社会控制难以解决的社会稳定问题。人们是通过观察与比较，在主观体验中作出心口一致的选择，使所谓的“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得到了初步的缓解。实践证明，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开放，仅仅依靠强制性社会控制是无法彻底解决发生在全国范围的特定条件下的各类社会冲突，更难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

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再度输入与传播，最令一部分人担心的依旧是这一理论体系来自西方国家，尽管再也不能“用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它的存在、发展、传授”了，可是总有一些人一见到它便如骨鲠在喉。其中最“敏感”的问题是，传统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大都采取了“传统与现代”二分法，也就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属于“现代社会”，所有欠发达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都属于“传统社会”，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西方化”、“美国化”甚至要“全盘西化”。当时中国社会的混乱状况，更加重了这种担心，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是依靠完全复制西方国家来实现的，日本不是，“四小龙”不是，中国肯定也不是。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不仅充分暴露出“二分法”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而且成为批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最为有力的佐证。我们还要看到，尽管传统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存在极大的弊端，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及发展道路可能产生某

些歪曲和误导的作用，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大趋势及具体的社会发展障碍与克服障碍的路径等问题上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一些经典作家的观点及其著作，对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与进步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与自我完善。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传统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受到了来自非西方国家学者的挑战，不少西方学者也对传统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大量的质疑，于是，在激烈的辩驳和讨论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新的理论观点，形成了一些新的学派，诸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增长极限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人的现代化理论等，这些理论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社会发展理论”向着科学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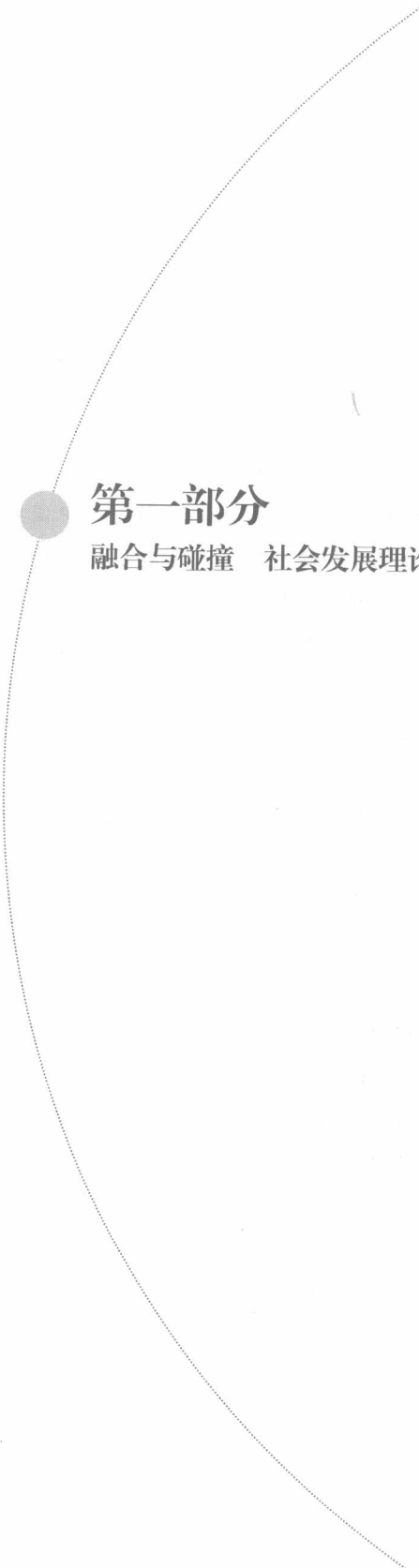
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际提出的。这一理论也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发展理论”，填补了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空白，不仅对中国的现代化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也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改革开放已经 30 年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出乎意料的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国内生产总值长期保持在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更喜人的是在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经济仍在健康地向前发展。在一片喝彩声中，我们注意到一些社会学家仍在不断地呼吁、提醒人们，在肯定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之时，应该看到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形势不容乐观，主要的问题均来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追求经济高速度发展的过程中，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都在不断加大。事实证明，单一的计划经济失败了，但是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如果听任经济的自由发展，政府不作为，即使经济再发展，地区、城乡、贫富差距问题也不会解决，甚至仍将加大。如果在已经扩大了差别的基础上再继续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那么，不在同一基础上的发展只会将差距越拉越大。我们的邻

国日本、韩国并不是这样，在人均生产总值与中国现在相当的时期，它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基本是齐头并进的，贫富差别是有的，但没有中国这样大，而地区差别、城乡差别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减小，最终基本消灭了。中国的经济越发展，地区、城乡、贫富差别反而越增大，这是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仍需要不断地开阔眼界，不断地了解世界。引进“一条鲇鱼”，激活一池的“沙丁鱼”，过去我们这样做了，要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还必须坚持这样做。在长期的“至少需要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改革开放将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一项宗旨。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融合与碰撞”，从社会发展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及其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对社会发展理论予以梳理和分析。第二部分“探索与实践”，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今，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了160多年的历史，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对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从来也没有中断过。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冲突与斗争中发展和前进的，最终以新中国的成立作为转折，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三部分“突破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经验，《一条鲇鱼——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通过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市场化背景下的农村干群关系、农村现代化路径的多样性选择等方面的分析，试图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做一些粗浅的探讨；同时以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对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及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形成的中国本土的发展理论，尝试着予以粗浅的讨论和剖析。



第一部分

融合与碰撞 社会发展理论的再度输入

一条鲇鱼，究竟指代的是什么呢？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怎样才能实现十几亿人的现代化理想？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究竟有哪些理论和经验可供我们学习与借鉴？发展中国家落后、欠发达的原因有哪些？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究竟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我们研究和探讨？这条“鲇鱼”引发了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热，也引起了对中国的发展及现代化的历史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反思。

社会发展理论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何人，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但是大致有一个学者们能认可的共识，就是从社会发展理论的定义出发寻找它的起源。苏国勋和严立贤认为，社会发展理论是探讨社会变迁的规律性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的学说。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关于社会发展的研究，它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狭义的发展理论指社会学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又称发展社会学，它以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协调发展问题为对象，主要探讨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理论、模式、战略乃至具体政策。^①刘佐和章俗认为，广义的发展理论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历史、现在和未来，由低级向高级、由落后向先进、由欠发达向发达过渡的过程；狭义的发展理论是研究“非西方欠发达国家”如何从欠发达、

^①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第282页。

欠发展状态过渡到发达状态的理论。^① 以上两种表述方式略有区别，但是都能对发展理论的起源框定出一个大致的范围，也就是说，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起源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而狭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习惯地以 20 世纪 50 年代为界将社会发展理论划分为两部分，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为传统发展理论；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为现代发展理论。

社会发展理论是 1979 年之后我们“赶快补课”的重要内容之一。传统社会发展理论，对于中国的老一代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从 1952 年以后，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也同样因其“不光彩”的“资产阶级出身”，而被“用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它的存在、发展、传授”。在中国销声匿迹了 27 年，直到 1979 年社会学恢复重建，社会发展理论才又重新获得了研究和发展的机会。因此，传统社会发展理论及国外针对传统社会发展理论进行的新的研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是崭新的。而现代发展理论对中国学者来说则是全新的，正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欠发展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所以受到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及改革开放的设计者、领导者的高度重视。

针对传统发展理论进行的最新研究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的现代化理论，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条鲑鱼”。

① 刘佐、章俗：《发展社会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第 36 页。

/第一章/

社会发展理论再度输入的历史背景

从 1978 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直至今日，中国进行的这场历时 30 年的改革开放，是继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这次社会变迁不仅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吸纳西方文化及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冲击和影响上，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都是空前的。

社会发展理论在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时具有总体上的统领作用，同时也为人们观察、认识和研究非常态社会，即处于急剧变迁中的社会提供了一个准确高效的切入点。尽管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但是像包括物质和精神在内的任何事物一样，社会发展理论也同样存在难以剔除的弊端及局限性；而且，在社会发展理论传入中国的时候，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中国的传统文化及近现代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矛盾与冲突的出现在所难免。如果进一步分析，社会发展理论不过是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社会发展理论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更是以中西方文化的全面碰撞为背景的。因此，应该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状况、中外文化的整体冲突、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及特征等方面来讨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再次传入中国。

一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社会

都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很穷，到底有多穷？以农村为例，1978 年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包括住房在内的自有财产不足 800 亿元，同时他们还对银行、信用社及社队集体负有数额极为可观的大量债务。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之前，除去平均每户估价不足 500 元的住房和少量的家具、农具之外，农民有的只是大量的债务。^①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同时，大量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摆在决策者与人民群众面前。1978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定，决定将全党的工作中心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经历的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

但是，中国毕竟封闭了几十年，又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诸多的问题和困难不可能转瞬之间消逝得无影无踪；同时作为社会的整体性改革，也就是一场利益格局的再分配，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改革将面临的困难与挫折都是难以预料的。

第一，尽管我们提出了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改革之初在理论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改革开放就可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使本该有序的改革变成无序的群体性的盲动；同样的原因，改革者的任何举措都可能由于“无章可循”而遭到反对者的指责，使改革开放寸步难行。一系列政治问题以及在中国很难脱离政治的经济问题仍然困扰着改革开放路线的贯彻执行。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轫于农村。1978 年安徽凤阳农民顶着巨大

^① 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农民、市场和制度创新——包产到户八年后农村发展面临的深层改革》，《经济研究》1987 年第 1 期。